

談洛陽出土的透雕夾層銅鏡

高西省

透雕銅鏡是一特殊且罕見的生活用具。由於其背與面分二次鑄造，然後扣合為一整體，所以又稱為夾層鏡、套鏡。這類銅鏡就目前發現情況看數量很少，主要見於洛陽地區的戰國墓中，其它地方很少見。由於這類銅鏡採用了透雕工藝，改變了以前素面或簡單的圖樣風格，所以，使這類銅鏡顯得尤為特別且珍貴。它的出現不但豐富了銅鏡的類型，而且在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史上具有獨特作用。這類銅鏡從出土情況看集中在東周王城所在地洛陽地區，由其形制看有方、圓兩種形式，它們的背面幾乎均以透雕龍紋圖案劃分成內、外兩區間，鏡面則平素且銅、錫的含量與背不同，均為二次鑄造再扣為一體。有些還在鏡背上貼金銀或彩繪或鑲嵌並與透雕紋樣配合使用，相映成趣，特別是貼金，往往起到了點綴作用，它以特有的黃或白襯托著綠色的銅器，更顯豔麗。因此，是極難得的上乘之作。

一、銅透雕鏡介紹

1. 透雕四龍貼金銀圓鏡，一件，為一九九六年洛陽道北戰國墓出土，現藏洛陽博物館。直徑一四·八，厚〇·三厘米。小環鈕，四葉紋鈕座。內區主題紋樣為四條昂首、弓身、勾尾作爬行狀透雕龍紋圖案組成，並作繞鈕同向旋轉一周。龍生角，翹翼，身均飾纖細斜角雷紋及雲紋。每隻龍的首、身、頸、翼、尾均貼飾金銀箔。其中頸、翼兩處貼金箔，其餘部位貼飾銀箔。外區緣上飾一周雙線相交狀幾何圖案。鏡背銹蝕嚴重，鏡面至今光潔銀亮，其背與面二次鑄造，並以鏡背包裹鏡面。此鏡出土時殘碎，在修復過程中，我們發現在其面內有黏合物，可見此鏡是以背透雕紋樣黏嵌在鏡面裡的。（圖二）



圖一

2. 透雕三龍紋彩繪圓鏡，二件，大小、形制完全相同，均為一九三一年洛陽金村大墓出土，直徑一〇·五厘米。小環鈕，內區主題紋樣作三條體呈「S」狀透雕龍紋繞鈕一周。龍首為側面像，張口、吐舌，頭上生角，四爪伸出。龍體上殘存彩繪。外區寬鏡緣上飾一周以朱、綠、白等色繪出的三角雲紋帶。鏡背與面二次鑄成而後合套為整體，包裹



圖二

3. 透雕四禽獸紋方鏡，傳一九三一年洛陽金村大墓出土，現藏日本千石唯司。邊長八厘米。半環形小鈕，四禽獸頭組成透雕鈕座。內區主紋為兩對禽獸以鈕為中心上下對稱狀，四禽獸頭部緊依小鈕。禽獸均作回首張口，長頸、弓背、長尾卷起行走狀。身飾纖細的鱗環紋及

的形式不清，現藏日本盧屋里川福三郎處。



圖三

4. 透雕四龍紋方鏡，一件，一九八八年河南洛陽西工區戰國墓出土。長、寬十一

斜線紋。四獸上下以兩個「U」形連接，其四尾均與方鏡四角連鑄。外區鏡緣飾一周纖細的三角紋，整個紋樣粗獷、飽滿，極具神秘怪異色彩，這種紋樣在戰國銅器紋樣中極為罕見。其鏡背銹蝕嚴重，而鏡光平，黑裡透亮，背上還殘留朱砂痕跡。面與背的包裹形式尚且不清（圖二）。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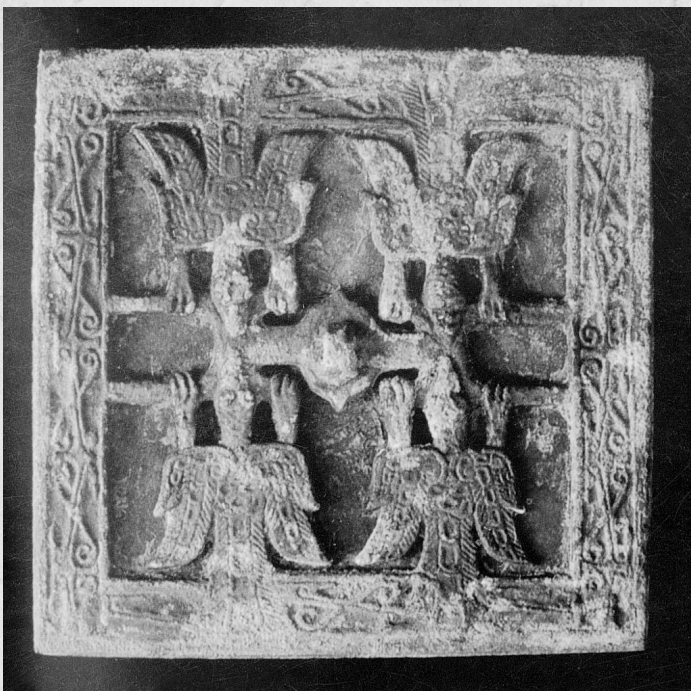
厘米，厚〇·四厘米。現藏洛陽博物館。小環鈕，柿蒂紋鈕座。紋樣以透雕不透雕明顯分為內、外兩區，內區主題紋樣為四條弓身、卷尾呈「S」狀龍組成，龍為圓突目，張口作前伸狀。身飾重環紋及短斜線紋，四龍首緊依四柿蒂鈕的左右兩葉並呈上下相對狀，四尾與外區相連，外區鏡緣飾雙重環紋一周，四角並間以圓圈紋，整個紋樣較為粗獷，與戰國時期流行的龍紋風格相同。



圖五

鏡背與鏡面係二次鑄成，並以鏡背包裹鏡面。由銹蝕痕跡看鏡面與鏡背銅成份不同，面較光亮。（圖二）

5. 透雕四龍紋方鏡，一件，傳一九三二年洛陽金村大墓出土，邊長九·一厘米，小環鈕，圓鈕座。主題紋樣以透雕不透明分為內、外兩區間。內區主紋為四條呈「S」形盤繞回環的透雕龍組成。四龍首緊倚圓鈕，四卷尾緊扣方鏡四角，通體飾鱗環紋。外區鏡緣為一周窄凹槽



圖六

帶，飾鱗環紋，此鏡據梅原末治介紹現藏美國堪薩斯市美術館。這件鏡紋樣別具特色，與常見的戰國龍紋有較大差異，與楚文化透雕鏡龍緊密的風格接近。

透雕銅鏡除洛陽發現外，在湖南、湖北及四川等同樣有發現，但數量很少，它們與洛陽透雕銅鏡一樣也有方圓之別。但形式紋樣比較接近。如一九七六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二〇一號戰國晚期楚墓出土透雕圓鏡（圖四）一件（註

一），它與洛陽道北出土圓透鏡極似，唯其主題龍紋變得小而密集，是戰國時期青銅器上常見的龍紋。被認為是仿效中原銅鏡的紋樣而鑄造的（註二）。一九七二年四川涪陵小田溪二號戰國墓出土龍紋方鏡一件（註三），它與洛陽戰國墓同類方鏡相似，唯內區主紋為以鈕為上下對稱的透雕雙龍，緣四角飾乳釘。這種兩龍上下對稱的形式在洛陽及其它地區銅鏡紋樣中未曾見過。

一九五四年長沙楓樹山之出土的一面方形透雕龍紋鏡（註四），值得注意的是其寬緣上四角以四個銀質小泡鉚釘，在主題龍紋上亦有四個銀質小泡鉚釘，既起到了裝飾作用又起到了「面」與「背」的扣合作用。除此之外，日本千石唯司還收藏透雕鑲嵌綠松石幾何紋銅鏡一件（註五）（圖五），透雕四禽紋方鏡一件（註六）（圖六）。《中國銅鏡圖典》圖一五〇著錄透雕四龍紋圓鏡一件，《中國古代銅鏡》圖版一六著錄一件，現藏美國紐約。

從以上記述可見，透雕夾層銅鏡雖出土數量很有限，但集中在洛陽地區，其它地區僅有零星的幾件，它們有著突出的共性特徵：幾乎均為透雕龍紋，且分二次鑄造，然後扣合為一整體，面往往含錫量較高，呈現出銀亮的光澤，雖均為透雕夾層，但紋樣形式及結構各具特色，個體特徵極為突出，幾乎不見紋樣相同者。特別是涪陵小田溪、湖北江陵張家山及

《中國銅鏡圖典》圖一五〇鏡與洛陽同類鏡有一定的差異，但紋樣簡潔的總體風格卻與洛陽透雕鏡接近，看來，它們之間有較密切的親緣關係。

二、透雕鏡的鑄造

透雕夾層鏡是戰國時期（目前考古資料）出現的一種新工藝銅鏡，它改變了早期銅鏡均為一次鑄造的傳統工藝，可以說它在我國銅鏡發展過程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是多姿多彩的戰國銅鏡代表作。

由於透雕銅鏡紋樣、結構獨特的原因，即背鑄成透雕紋樣，要使其具有照面飾容的功能必須另加鏡面。從前文介紹看，這類銅鏡背與面青銅的化學成份有顯著不同，即面是含錫量較高的青銅，而鏡背要鑄成很薄的透雕紋樣，若以高錫青銅鑄造易殘缺，易損，故這類銅鏡必須分鑄，否則無法形成透雕紋樣銅鏡。而且從目前發現情況看，這類銅鏡還未發現「背」、「面」分離的個例，那麼，這類銅鏡是如何鑄造的呢？何堂坤先生根據戰國時期青銅劍「刃」部與「脊」部採用榫卯結合法，（這種劍很少見到脊與刃分離）推測「……這類鏡子應該是先澆鏡背，之後才澆鏡面；金屬冷凝後與鏡面部份連在一起的鏡緣同樣會產生一個緊箍力，從而加強了兩部分金屬嵌合」（註七）。

從洛陽博物館藏的二件透雕鏡看都是面扣合於背上的，至今鏡面周邊輪廓清晰，江陵張家山楚墓夾層鏡也是「背」包「面」的。傳洛陽金村出土的現藏日本千石唯司的透雕四獸紋方鏡由其照片觀察可能是「背」包「面」的，長沙楓樹山方鏡為鏡面包裹鏡背的，看來包裹形式並不完全相同。那麼，透雕夾層鏡是否如何先生推測的那樣鑄造呢？其一，這類透雕鏡體較薄，尤其是鏡面幾乎均為較薄的銅片，很難鑄造出具有榫卯結構以扣合「面」與「背」。其二，從洛陽博物館藏的二件透雕鏡看也並非如此。其中一件出土時已殘破，我們在修復過程中發現其「面」、「背」上有黏合物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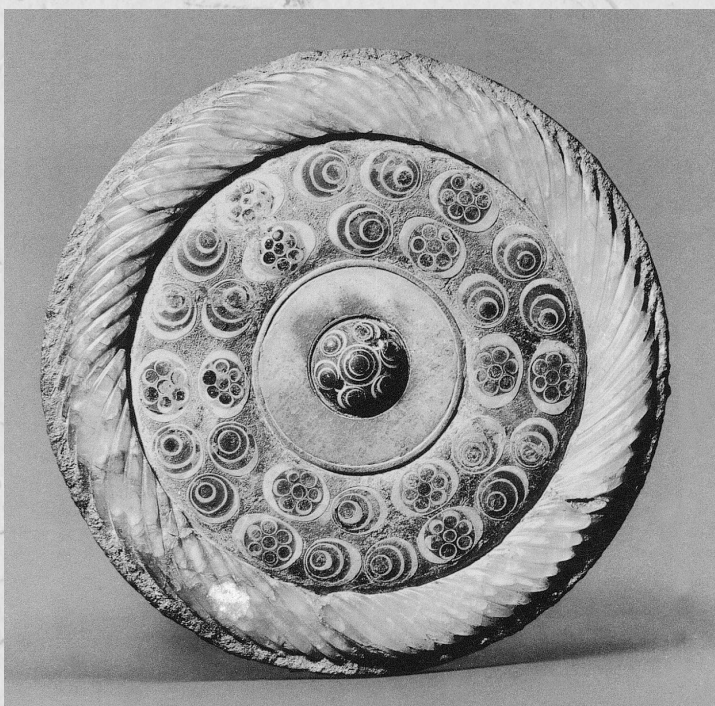
湖南長沙北門楓樹山十一號墓出土的透雕方鏡四角和紋樣上有用銀釘鑲嵌的小圓泡，實際上，它除了起到裝飾作用外，主要還應是起到加固和連接作用（註八）。看來這類的銅鏡並非如何先生推測的那樣鑄造。它們應是兩次分鑄然後再黏合在一起，或兩次鑄造後用銀釘使「背」、「面」合為一體的。由於這種特殊銅鏡發現數量很有限，有些我們還不能確定其怎樣鑄作，有待進一步通過新發現，特別是通過殘損的鏡來觀察其扣合方式，搞清其鑄造工藝過程。

三、透雕銅鏡的產地

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到戰國時期已經達到了

成熟時期，無論從其類型、數量、鑄造工藝、圖案紋樣都較前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就目前考古資料所知，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區，特別是湖南省境內是戰國銅鏡的集中出土地，而且這一地區以銅鏡隨葬幾乎成爲一種習俗。但在黃河流域的三晉地區出土銅鏡的數量很有限，在諸侯國墓葬中似乎還未形成隨葬銅鏡的習俗。然這一地區出土銅鏡類型豐富，且有較多的特種工藝加工鏡（註九）。這是湖南及其它地區所不及的，那麼，透雕銅鏡究竟產於何地呢？

從前文分析介紹看戰國時期透雕夾層鏡雖出土數量不多卻集中在洛陽地區，且出土地點確切，分布在東周王城區內。陳佩芬先生考證說：「透雕夾層鏡這類銅鏡究竟流行於哪些地區，已不可知，但從銅鏡表面腐蝕特徵分析，可能大都出於黃土地帶，這類銅鏡雖在四川和湖南也有少量出土，但所見多數不是這些地區的出土物」（註十）。那麼，我們就來分析以下洛陽透雕鏡的紋樣特徵。西工區四龍紋方鏡及道北圓鏡上的龍紋均弓身卷尾、勾喙，這種特徵是這一地區青銅器上常見的紋樣。金村出土的二件透雕彩繪鏡在湖南地區及其它地區目前同樣未發現，湖南雖出土有彩繪鏡及透雕鏡，但未見彩繪透雕鏡。金村出土方鏡上的四禽獸紋及道北圓鏡以金銀箔黏貼在其它地區未見。而這種貼金銀工藝在這一地區戰國銅鏡中常被運用。



圖七

這一地區還發現有嵌玉琉璃鏡（圖七），錯金銀狩獵紋鏡（圖八）及嵌料珠貼金箔山字紋鏡（註十一）。它們在別的地區從未發現。在洛陽地區錯金銀等特種工藝銅器同樣有較多發現，如金村大墓就出土了大量錯金銀及鑲嵌琉璃銅器。而金村大墓的墓主，學者們普遍認為這一墓群屬於周王室（或包括臣屬）（註十二），可見，如此精美的銅器是王室貴族才能享用，而這種它區不見的特種工藝鏡是作為東



圖八

周王都所在地洛陽地區鑄造的。據史載戰國時期東周王室還擁有數量眾多的各種手工業者「百工」。《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二十五年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八月辛酉，司徒丑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洛陽地區出土的這些精美且罕見的銅鏡應該是這些宮廷「百工」鑄造的。其實一些傳世品我們仍可以定它們是洛陽

地區鑄作的。如前述的《中國銅鏡圖典》圖一五〇著錄的那件與道北戰國墓出土的透雕四龍圓鏡極似，特別是主題紋樣、鈕、鈕座及龍紋與之幾乎沒有區別，只是這件鏡僅有很窄的緣，未有雙線交叉狀的幾何圖案。日本千石唯司藏的方鏡，四禽頗具特色，在別的戰國銅鏡上未曾發現，該鏡雖未有明確的出土地點，但此鏡的特徵及紋樣結構形式與金村大墓出土的四禽方鏡相同，唯一為四禽，一為四禽獸。總之，從總體風格看，這兩件透雕銅鏡與兩湖地區楚鏡繁密的龍紋風格相去較遠，而與洛陽地區龍紋紋樣簡潔的風格雷同。它們為洛陽鑄造似無大問題。

註釋：

- 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二〇一號楚墓清理簡報》，《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
- 二、劉一曼〈試論戰國銅鏡的分區〉，《考古》一九八五年十一期。
- 三、四川省博物館等：《四川涪陵地區小田溪戰國土坑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五期。
- 四、八、李正光：〈略談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銅鏡〉，《考古通訊》一九五七年一期。
- 五、六、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銅鏡》圖版一六、一七，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七、何堂坤：《中國古代銅鏡的技術研究》，第四章·銅鏡鑄造技術，一一二五頁。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九、一九三一年金村大墓出土錯金銀狩獵紋銅鏡及嵌玉石銅鏡、彩繪銅鏡、貼金銀透雕紋鏡等。

十、陳佩芬：《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中國青銅器全集·銅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十一、洛陽出土的山字鏡並不多見，除金村大墓發現二件外，有明確出土地點者未見報導。一九九二年洛陽西工區三九四三出土一件（洛陽市西工區CM1394三戰國墓），《文物》一九九九年八月，它們經過修復一件為四山，一件為六山，並非原報告所說均八山鏡，這兩件山字鏡特別之處是山字中間嵌有琉璃珠及金箔。這是前所未見的。

十二、李學勤先生認為這處墓葬群不是東周君的，應屬周朝，很可能包括周王及其附葬臣屬（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李德方先生認為洛陽東周王陵分為周山、王城和成周等三大陵區，成周陵區即金村陵區，應屬敬王至魏王，凡十一王的陵地（李德方，《東周王陵分區考辨》，《洛陽古墓博物館館刊》《創刊號》一九八七年）。朱鳳瀚先生指出「已有學者提出的這一墓群屬於周王室（或包括其臣屬）的見解是最為妥當的」（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九八〇頁，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